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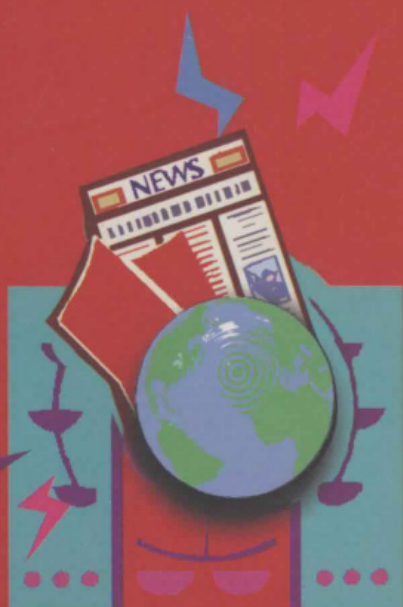
大眾傳播學叢書

正中書局

中國近代報業 發展史 1815~1874

卓南生 著





中國近代報業 發展史 1815~1874

ISBN 957-09-1171-9 (898)



00250



9 789570 911718

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 1815~1874 《大眾傳播學叢書》

著 者：卓南生
發行人：武奎煜
出版發行：正中書局
地 址：台北市衡陽路 20 號
電 話：(02)23822815 · 23821496
FAX NO：(02)23822805
郵政劃撥：0009914-5
出版日期：西元一九九八年四月臺初版(民 87)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九號(9587)
分類號碼：898.00.001(2000)(4.4)(版)偉
ISBN 957-09-1171-9

定 價：二五〇元

海外分局

香港：集成圖書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油麻地北海街七號地下
電話：(852)23886172-3 · FAX NO：(852)23886174
日本：海風書店
地址：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神保町一丁目五六番地
電話：(03)32914344 · FAX NO：(03)291-4345
泰國：集成圖書公司
地址：曼谷羅華力路 233 號
電話：2226573 · FAX NO：2235483
美國：華強圖書公司
地址：41-35, Kissen Boulevard, Flushing,
N.Y. 11355 U.S.A.
電話：(718)7628889 · FAX NO：(718)7628889
歐洲：英華圖書公司
地址：14, Gerrard Street, London, W1V 7LJ
電話：(0171)4398825 · FAX NO：(0171)4391183

〔自序〕

中文版自序

新聞史學界前輩或同行每每問起《中國近代新聞成立史》的中文版是否已經面世時，我總是感到幾分欣慰，同時也很覺尷尬與不安。欣慰的是，多年來埋在舊書報中的挖掘和考證成果有人關懷，可謂「吾道不孤也」。尷尬與不安的是，中文譯稿雖已斷斷續續完成，其中主要內容也已在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學術刊物上分別發表，却苦於無法騰出時間詳細校閱和定稿。因此，中文版的出版合同雖已簽了好幾年，却始終沒法交卷。所幸本書未成明日黃花。在過去的十幾年裡，筆者考證的這段報史尚未有新資料發現。

回想自己走過的中國新聞史研究的道路，路程是曲折與孤獨的。六十年代中期，筆者隻身從位於赤道的新加坡飛抵東京學習新聞學。當時日本學界對中國新聞史並不關心。至於留學生界，念新聞學的可以說是少之又少。七八年的留日生活裡，除了在早稻田大學新聞系曾遇見一名比我高一年的台灣同學之外，就只有在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認識的幾位來自韓國的研究生（幾乎都是韓國各傳媒駐日特派員）了。由於關心課題不盡相同，彼此也少有交流，更談不上對中國新聞史研究的相互切磋。

不過，這個孤立或孤獨的大環境，却促使筆者走上了一條略異於一般中國新聞史研究者的道路。在缺乏同行和知音的背景下，筆者在

起步研究時只好盡可能地向日本新聞史學界尋求借鏡，並從中學習其嚴謹的治學態度與方法論。

尤其難得的是，正是從研究日本新聞史入門，筆者很早就接觸了一批一般中國新聞史學者不會留意或沒有機會查閱的「官版翻刻漢字新聞」。原來在幕府末年，曾有大量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與香港發行的漢文報刊傳入日本。這些報刊或以手抄本的形式在知識份子中流傳，如《遐邇貫珍》；或經過當時「蕃書調所」（後易名為「洋書調所」）的教授們審閱和刪定後翻印出版，如《官板六合叢談刪定本》、《官板中外新報》、《官板中外雜誌》和《官版香港新聞》（「板」、「版」皆根據原件之寫法——筆者按）等。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曾經廣泛地流傳於江戶知識界及在早期的日本報業史上佔有特殊地位的翻刻版漢字新聞，由於係經當局的審閱和刪改，有的還保留原名，有迹可尋，如上海出版的《六合叢談》被刪稱為《官板六合叢談刪定本》。有的則被改得面目全非，如香港《孖刺西報》（*The Daily Press*）中文版的《香港船頭貨價紙》則被刪稱為《官版香港新聞》。由於中文原件不易尋覓或者根本已告佚失，這段中文報史的研究不得不借助於這批東洋翻刻版。又由於一部分報名曾被改得面目全非，而給中國新聞史學界帶來了一些混亂和誤解。自從一九二七年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將日本《官版香港新聞》的中文報刊之原名誤為《香港新聞》以來，中國新聞史學界就一直沿襲此說，以為在香港曾出版過名為《香港新聞》的刊物。從這個角度來看，改頭換面的東洋翻刻版確曾給中國新聞史研究者增加了新難題。不過，認真而言，還得感謝這些官版翻刻本。要不是有這些雖經刪改，但妥善地保留下來的東洋版，我們可少了不少足以印證早期報史的有力資料和線索。如果說，筆者對中國近代報史的考證與研究有些許突破的話，那麼，其中部分功勞也許得歸於早年接觸了這些「來歷不明」的報刊。正是在這些「西方及中日文化交流產物」（？）的刺激下，筆者產生了極力探求中文原件予以印證，以便正本清源的動機。

筆者是在一九七〇年到立教大學攻讀研究院時，從導師平井隆太郎教授（以研究「瓦版新聞」聞名、日本江戶傳播史權威）那兒獲得官版漢字新聞的研究線索的。在平井先生的推薦下，筆者得以拜訪了當時還健在的日本新聞學與新聞史開山鼻祖的小野秀雄先生。那時高齡逾八十的小野先生雖已離開了由他一手培植的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和上智大學新聞系，但卻退而不休，正在撰寫其《新聞研究五十年》的大作。雖然與先生的交談只有兩次，但他對新聞史研究的熱情以及對年輕人教誨不倦的精神，却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記得在日式平房的書房裡，小野先生從衣櫃取出了用布巾包裹的資料和文件。他一邊滔滔不絕地向筆者敘述當年曾兩度迢迢千里，前往大英博物館查閱《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等華文報刊的經過，一邊解開資料包讓我翻閱他那寫得密密麻麻的讀報筆記。他還拿出了私藏的《遐邇貫珍》原件，並建議我最好從資料較易找到的漢文報刊著手研究。

在小野先生的啓發下，我開始到處打聽早期流入日本的漢文報刊的下落。幾家大學的圖書館不用說，早稻田大學、東京大學附近與神保町的舊書店都是我常涉足之地。在個別舊書店店東的特別照顧下，一些尚未整理的書庫也常有我的踪影。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除了一部分已為人所知的報刊原件、官版翻刻新聞與寫本之外，並沒有新的發現。如此只是耕耘而無收穫的日子和新聞史料調查與研究的滋味，或許只有真正曾身歷其境的同行才能體會和知曉。

眼看著論文提交日期步步逼近，我只好利用日本所藏的部分原件及其手抄本等資料來完成碩士論文。不過，那時我已經萌發了步中國報史專家戈公振先生及日本新聞史學者小野先生後塵，前往英國倫敦查尋早期報刊原件及相關資料，以便整理近代中文報史的念頭。

在這個時期，我也常常利用途經港台的機會，走訪兩地圖書館及新舊書坊尋找有關史料，並拜訪了還在《香港時報》任職的報史研究前輩林友蘭先生及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著名報史學者李瞻敦

授，從他們那裡得到了不少的教示。當時，林先生正在陸續撰寫香港早期報業史，但苦於找不到原件予以印證。他很中肯地告訴筆者很多原件已無法在港台和中國大陸找到，並希望筆者能利用在國外學習的有利條件，努力挖掘新的新聞史料以填補這段報史研究的空白。這番話對於剛剛開始敲叩報史之門，卻又四處碰壁的筆者來說，無異是莫大的鼓舞。

一九七三年夏，筆者修畢博士課程，正在考慮前往英倫時，恰好接到新加坡《星洲日報》總經理黃溢華先生和總編輯黃思先生的盛情邀請，要我加入報社撰寫社論，以便減輕並逐步替代老主筆郭史翼先生的工作。撰寫社論與時評，也是我一向的興趣所在。作為新聞系畢業生，我自然不願輕易放棄這個學以致用的機會，於是匆匆回國，投身於繁忙的國際時評活動，報史的研究工作只好暫時停頓。不過，我一直還惦念著那未完成的報史作業。

兩年多後，在確認了郭老主筆的健康狀態還能繼續主持筆政的情況下，我鼓足勇氣向報館提呈停薪留職，前往倫敦留學的要求，並幸運地獲得館方的同情與支持而成行。緊接著的又是一番「大翻書報」的作業。關於倫敦佈道會傳教士所辦宗教月刊的研究，因原件資料比較齊全，所以進展相對地十分順利。因此我很快便將舊論文中《遐邇貫珍》及《六合叢談》的部分改寫，並先後刊於母校立教大學學術刊物《應用社會學研究》上。至於早期日報（即所謂「新報」）的研究則進展緩慢，但也總算找到了一些線索，並發現了好些尚未被挖掘與利用的重要報紙原件。其中包括了刊於一八七二年五月四日的《香港中外新報》（藏於劍橋大學圖書館）和一八七四年二月四日創刊後最初幾個月的《循環日報》（藏於大英圖書館）的報紙原件。

筆者是在大英圖書館東方圖書研究室職員陸玉英女士的協助與特別許可下，在 Store Street 的書庫中發現《循環日報》的原件的。當時，該報尚未被複製成縮微膠卷。因此，筆者除了每天在圖書館一頁一頁地翻閱報紙和做筆記之外，不得不要求館方網開一面，特許我自

帶相機拍攝報紙的原件。在圖書館當局准許下，我一大清早就勞駕了當時正在倫敦攻讀美術，現為著名畫家的老同學唐大無兄帶了大量器材進入書庫，幫我拍攝了不少《循環日報》。現在回想起來，當年為了報史研究，未免過於興師動眾。

在收集了大量的資料後，筆者興致沖沖地回到了東京。當時正準備結合日本的資料進行相互印證的研究，無奈却接到了《星洲日報》館方的急電，要我馬上回去報到。於是乎，我只好辭退了剛租下的房子，返回新加坡出任執行編輯兼社論委員。一九八四年春天，在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專家計劃下，筆者重返日本，總算有了整理擱置多年的資料的機會。邊研究邊在日本的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其中包括《香港華字日報》創刊年號考，第一家中文日報《香港中外新報》及其前身的《香港船頭貨價紙》等考證文章。一九八六年二月，筆者完成了報史研究的博士論文，並於同年九月獲取立教大學首名社會學（主修新聞學）博士學位。

八十年代中期，在筆者逐篇將研究心得發表於日本學術刊物以及日文版《中國近代新聞成立史 1815—1874》（東京百堅利社、1990年）面世後，筆者與兩岸的學者也有了密切的交流。在與中國大陸學界的交流方面，首先應該感謝上海復旦大學新聞系張國良教授。他曾花費了不少時間和精力將拙作不同章節譯成中文，先後刊於《新聞傳播》（中國黑龍江省新聞研究所）、《新聞大學》（復旦大學新聞系）和《新聞研究資料》（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等學術刊物上。正是在張教授的翻譯、介紹下，筆者的上述研究引起了大陸學界的關注。特別是報史學界前輩方漢奇教授和寧樹藩教授更對筆者的考證予以肯定和諸多勉勵。

一九九二年，中國新聞史學會在北京宣告成立。筆者在會上宣讀了已在日本發表了的有關《循環日報》的考證論文，並結識了不少中國新聞史的專家和學者。能和這麼多的同行進行交流，對於長期寓居東瀛，在中國報史領域踽踽獨行的我來說，感受是十分強烈和新鮮

的。

差不多在同一時期，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系主任朱立教授（現為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院長）的介紹下，筆者結識了台灣著名中國新聞史學家朱傳譽先生及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的汪琪教授和彭家發教授，還與在七十年代有一面之緣的陳世敏教授重逢。在他們的推介下，數篇有關報史考證的拙稿得以在政大的《新聞學研究》上發表。筆者與台灣新聞傳播學界的交流有了進一步的加深。本書得以在台北順利出版，就是承蒙陳教授的推薦。

從一九八六年提交博士論文迄今已逾十年，一九九〇年日文版《中國近代新聞成立史 1815—1874》問世也逾七載。這些年來，我很高興地看到不少報史的新著引用或參照筆者有關的考據。不過，由於本書遲遲未能出版，致使一部分只看到個別拙稿而未閱全書的學者在論述有關報史時，雖部分採用筆者的新觀點，但又部分地沿襲舊說而產生混亂與前後矛盾的現象。在這方面，拖延本書出版的筆者也有一定的責任。

值此付梓之際，謹向所有關心此書出版以及在編印過程中予以各方面協助的前輩、同行與朋友致以衷心的謝忱。特別應該感謝為此書穿針引線的陳世敏教授和負責煩雜編務的正中書局編審部的胡慧馨小姐，以及在百忙中為本書題寫書名的新加坡著名詩人、第一書法家潘受老先生。

卓南生

1997年深秋於日本京都

〔日文版原序〕

珍貴的研究成果

日本立教大學名譽教授 平井隆太郎

在中國，類似於報紙的資訊傳媒與其文化一樣歷史悠久。宋代的王安石曾評《春秋》為「斷爛朝報」，於是一部分歷史學家就此認為，周代編年史書《春秋》是中國報紙的起源。「朝報」是中國宋代發行的一種報紙，相當於唐代的「邸報」。其實，針對這部被公認為古典權威的《春秋》，王安石當時只不過是貶之為有如宋代「朝報」那樣零散，沒有史書價值可言而已，並非認為《春秋》就是類似於「朝報」的新聞媒體。

一般認為，中國的報紙起源於唐代的「邸報」，它和羅馬時代的《羅馬公報》一樣，流傳於民間。「邸報」又稱「雜報」、「朝報」、「塘報」等，其傳統風格被後來清朝的《京報》所繼承。

本書作者卓南生君把「邸報——京報」稱為中國的「古代報紙」，把歐美人士以東南亞及中國沿海港口為據點，定期出版的華文資訊傳媒，稱作「近代型中文報紙」。換句話說，作者是將後者劃入歐洲近代出現的所謂「報紙」的系統與範疇。

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曾進口許多介紹歐美報業情況的專著。與此同時，日本人撰寫的有關研究著作也不少。不過，或許是由於中國報業不受重視的緣故，迄今為止，較為人所知的，只有一九四三年出版的《支那新聞學史》（原書為戈公振在一九二七年出版的《中國報

學史》)。這幾乎是唯一的一部介紹中國報業發展史的專著。

對於作者在著作中提及的「古代報紙」即《京報》一類的刊物，即使是在江戶時代，也就是日本在文化上一邊倒向中國的時代，或者更早的年代，日本方面的有關知識也是十分貧乏的。在寶歷十三年（一七六三年）出版的青木昆陽的《昆陽漫錄》中，在涉及「邸報」時，也和戈公振一樣，引用了宋史的曹補傳，而沒有聯想到「報紙」這個概念。

對於清代的《京報》，駐於長崎的中文通譯應該是知道的，但一般知識分子却未必會知曉。當時有關中國的訊息是通過貿易船定期得到的。在貿易船長向長崎地方政府報告後，有關訊息即被傳抄而流傳全國。其中相信也包括來自《京報》的訊息，但這一切只是根據船長所述，並沒有注明出處。這一點，與著名的《阿蘭陀風說書》（即《荷蘭傳聞書》）是一樣的。

幕府末年的安政年間，取代原來的《阿蘭陀風說書》呈獻給幕府當局的是，荷蘭東印度總督府在巴達維亞（現椰加達）發行的機關報《爪哇新聞報》(Javasche Courant)。從此，在日本人當中，有關歐美報紙的知識迅速得到普及。也在同一時期，日本對中國的報紙有了進一步的了解。本書的研究對象，即在中國沿海城市出版的華文報紙，就是在此時期傳入日本的。日本文久年間（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三年）出版的一批所謂官版翻印報紙，如《官板中外新報》、《官板六合叢談》、《官板香港新聞》、《官板中外雜誌》等。另外，還有一些並非官版的報紙，如《遐邇貫珍》、《香港新聞紙》等也為人所知。《香港新聞》和《香港新聞紙》的原件是《香港船頭貨價紙》，其他各報則使用原來的報名。這些官版報紙注有日文句號和訓讀的符號，對於當時的知識分子來說並不一定需要，因為實際上，在官版翻印以前，抄寫自原件的寫本已經有所流傳。在喜多村信節的〈聽來的事〉一文中，曾根據長崎地方政府的報告，記錄了嘉永六年（一八五三年）的天德王之亂事件（太平天國事件），原文如下：「清山香港

風說書遐邇貫珍書曰、上海火輪郵船來信、非路兵信云云、九月初四日至，曾見到蕞城傷兵三人、而長髮黨眾死者五六百人、逃逸者二千人等等」。可見，早在文久年間官版翻印報紙出現的七年以前，《遐邇貫珍》等華文報紙就已為日本知識分子所熟悉。日本的嘉永六年是中國清朝道光三十年，也正是《遐邇貫珍》創刊之年。

此外，萬延元年（一八六〇年）名村五郎八在他的〈亞行日記〉（「亞」係指「亞墨利加」，即美國）（收錄於《萬延使節隨行記二》）中記載：「市中西邊有書院，叫英華書院。書鋪設有唐文書。香港船頭貨價紙一份十分錢可買到。這就是每日發行的活字印刷漢文報紙」，「到漢英書林英華堂一趟，在英華堂買到遐邇貫珍、六合叢談等書」……。

再如，在題為〈花吹雪隈手迺塵〉這一有關幕府末年的記錄（《近代風俗見聞集第四部》）中，這樣寫道：「文久三年（一八六三年）、閏三月六日，在一個叫爪哇的地方讀賣、歐洲一帶香港發行報紙。」此文有詞不達意之處，因為它是經過許多人輾轉抄寫的消息。內容是關於萬延元年（一八六〇年）的大老伊井掃部頭的暗殺事件：「萬延庚申、茲聞在日本國京城、有十七人行、刺其國主。查此十七人、乃係美督公子之從人、此美督公子不願外國人在日本國貿易、因上年日本國主、與外國立和約、準各國、船進日本、各港貿易、是以美督公子有謀反之意、買（？）人謀刺國主、幸得其國主護身兵勇、保駕救脫國主、口被折傷、日本京城總督照會、各外國公大臣、各宜謹慎防虞」（國主係指伊井大老，美督公子則指水戶齊昭公）。上述消息是事件發生後三年才報道的，它之所以在海外引起反響，大概是由於其趣味性。從登載的時間看，應該是刊於《香港船頭貨價紙》上的報導。

由此可見，在幕府末年，日本對當時來自中國的華文報紙及通過荷蘭傳入的海外訊息是同等重視的。但在明治維新以後，由於日本的文化氣息迅速地一邊倒向歐美，各方對有關華文報紙原件的研究陷入

了近乎於零的狀態。其原因，一方面是由於人們對中國文化的關心淡薄，另一方面也與報紙原件之不易覓得，以及閱讀理解能力迅速下降有關。

卓南生君經過多年心血寫成的這部著作，可以說是首次填補了日本在這研究領域之空白並發出光芒。實際上，在國際學術界裡，對本書所涉及的中國報業史有關時期的研究或論著，甚至比日本還更為貧乏。從這個角度來看，說本書具有極其重大意義，毫不過分。

在本書中，作者詳細闡明了中國近代報紙產生與發展的歷史過程。跨越年代從一八一五年馬六甲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發刊開始，至一八七四年香港的華文日報《循環日報》創刊為止。

作者指出，以在馬六甲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為首的，在東南亞和中國沿海城市出現的早期報紙，最初是基督教以傳教為宗旨的宗教月刊，後來，則把重點逐步轉向對中國人進行思想啟蒙教育。這些刊物是以西方立場為出發點的，它們逐步發展而日趨接近於近代報紙，其代表是香港的《遐邇貫珍》。《遐邇貫珍》也是作者一九七二年提出的碩士論文的中心題目，作者對它尤有詳細的論述。如前所述，在永嘉六年（一八五三年），《遐邇貫珍》已為日本人所知，它恐怕是最早傳入日本的一份華文報紙。因此，作者的有關論證在日本將會引起關注。

必須指出的是，作者對最早的華文日報《香港船頭貨價紙》的考究，是有其創見的。在日本，該報是以《香港新聞》的報名而為人所知，它曾經成為當時翻印與手抄的對象。該報創刊於一八五七年，在一八六〇年代中期改名為《香港中外新報》。萬延元年九月，名村五郎八在香港買到的是改名前的《香港船頭貨價紙》。據作者說，「香港船頭貨價紙（小型版）——香港中外新報（大版）是最早採用兩面印刷的近代報紙，並且成為後來報紙的模式。」與此同時，作者也指出，這家報紙是代表英國利益的，具有殖民地報章的特性。

相對上，作者認為在某種程度上較能反映中國人立場的報章，是

一八七一年在香港創刊的《中外新聞七日報》，該報於第二年易名為《香港華字日報》。原因是，這家報紙雖然是由英國人所辦，却聘請中國人（陳靄廷）主持編務工作。

最後，作者把重點放在一八七四年在香港創刊的《循環日報》上，並對該報進行詳細的分析，從而證實這是一份名符其實，站在中國人立場，由中國人自辦成功的最早的中文日報。

本書的成功在於作者全面地考察了十九世紀初期出現的「近代」華文報紙的整個發展過程，並為讀者展示了一幅清晰的鳥瞰圖。最後，想附帶指出的是，早期華文報紙始自殖民地報紙的這一特徵，在很多方面與幕府末年外國人在日本發行報紙的情況，頗有相似之處。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本著作的研究成果對於日本近代新聞史的研究也毫無疑問地具有寶貴的參考價值。作者卓南生君作出的上述貢獻，令人深感敬佩。

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 1815-1874

〔目 錄〕

中文版自序	ii
日文版原序 平井隆太郎	viii
第 1 章 緒論	2
第 2 章 十九世紀初期中文報刊誕生背景	12
一、中外關係的特徵	12
二、基督教新教對華的拓教活動	14
三、馬禮遜與東印度公司的合作關係	15
四、清朝的禁教政策及來自天主教的阻礙	17
第 3 章 基督教在馬六甲的傳播和《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的誕生	20
一、馬六甲傳教的開始與中文報刊的發行	20
二、《察世俗》的內容與特徵	28
第 4 章 鴉片戰爭前的中文報刊	46
一、《特選撮要每月紀傳》(1823 ~ 1826 年)	46
二、《天下新聞》(1828 ~ 1829 年)	53
三、《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1833 ~ 1835 年；1837 ~ 1838 年)	55
四、《各國消息》(1838 ~ ? 年)	73

第 5 章 香港最早的中文報刊

——《遐邇貫珍》(1853 ~ 1856 年)	78
一、鴉片戰爭後新教傳教根據地的轉移	79
二、編者及該刊創辦與停刊的經過	80
三、《遐邇貫珍》的特徵與內容	85
四、結論	97

第 6 章 上海最早的中文報刊

——《六合叢談》(1857 ~ 1858 年)	102
一、與《遐邇貫珍》的相似點	105
二、發行宗旨與版面安排	106
三、新聞報導的態度	108
四、結論	112

第 7 章 中國最早的中文日報

——《香港中外新報》及其前身《香港船頭貨價紙》	116
一、新史科的發掘與新學說	116
二、《香港船頭貨價紙》創刊背景及該報與《孖刺報》的關係與特徵	135
三、《香港船頭貨價紙》的內容與特色	156
四、結論	172

第 8 章 以華人主持為號召的中文日報

——《香港華字日報》及其前身《中外新聞七日報》	180
一、《香港華字日報》創刊年號的考証	180
二、《中外新聞七日報》的特徵與內容	190
三、結論	208

第 9 章 中國人自辦成功的最早中文日報—《循環日報》	212
一、王韜的生平	213
二、以「華人資本、華人操權」為標榜	216
三、王韜的辦報哲學	220
四、《循環日報》的版面及其特徵	226
五、評論立場	231
六、結論	238
第 10 章 總結	242
一、宗教月刊時期（一八一五至一八五八年）	243
二、「新報」的萌芽期與成長期（一八五七至一八七四年）	246
日文版後記	252
附錄 I 早期主要中文報刊一覽表	254
附錄 II 早期主要中文報刊序文及重要啓事	256
附錄 III 參考書目及文獻	274
索引	284